

港城大校长梅彦昌：满世界“三顾茅庐”



梅彦昌，1956年出生于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博士毕业，亚太材料科学院院士、新加坡工程师学院创始院士。曾任新加坡国立大学常务副校长（创新与企业），南洋理工大学常务副校长及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现任香港城市大学校长。

阳春三月，记者在北京的一家酒店里见到了梅彦昌。他从香港远道而来，参加香港城市大学（以下简称港城大）法律学院举办的论坛活动及校友联络处举办的华北校友晚宴。

自从2023年就任港城大校长以来，梅彦昌马不停蹄，与内地诸多高校合作交流。提到在内地的见闻和感受，他总是相当雀跃：“变化太大了，太大了。”

“香港需要初创公司”

梅彦昌第一次到中国内地是1988年，去的第一个城市是上海。“当时南京路上只有自行车，人们的生活条件很差。仅仅用了一代人的时间，中国就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上还有哪个地方发展得这么快？我找不出第二个。”

正因如此，2023年，当他正式履职港城大校长时，心情是激动的。“香港背后是广阔的内地，人才多、资源多、发展机会多，我觉得可以大有作为。”

当时，梅彦昌已经在新加坡学术界拥有了很高声望。他既是大学教授，也是发明家，主攻领域是将高性能生物材料应用到医学器材上。在3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他获得近130项原创专利，其中一项是用生物降解材料制成心血管支架。他还成立了几家衍生公司，他的研究团队成功研发纳米结构技术传递药物，以治疗因青光眼可能导致的失明，并因此获得了2014年新加坡总统科技奖。

“2004年刚担任（南洋理工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院长时，整个学院的教师人数不到40名。我对大家说，10年后，我们要在专业领域成为世界排名前十的学院。大家都以为我疯了。10年后，在世界大学排行榜上，我们学院排在材料专业榜的第八名。其实我没有特别的本领，就是把精力花在吸引人才上。”

为提升师资水平，梅彦昌每年到世界各地高校“挖人”。除提供优厚待遇外，他还给予人才充分的尊重，经常“三顾茅庐”。这种理念和作风被他带到了港城大。

“我入职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跟同事们说，我们不要做第二个香港大学，也不要做第二个香港中文大学，而要做香港城市大学第一。”他不断加强港城大与各地高校的合作交流，成立了“港城大青岛创新中心”，又在广州南沙设立了“联合研究实验室”等，并全力推进港城大（东莞）的建设和发展，使其在2024年9月正式落成启用。“港城大（东莞）的教学标准与香港本部是一样的，我们既吸引内地优秀学子来就读，也鼓励香港学子赴内地交流学习。希望在未来5到10年里，港城大帮助培养出更多科学家。”

近年来，人工智能发展迅猛。在梅彦昌

的推动下，港城大于2024年10月成立了香港人工智能与科学研究院。在他看来，香港需要科创产业，希望培养更多具有创新精神和创业能力的人才。“香港需要初创公司，即使大部分可能失败，但少数成功者将为香港本地年轻人提供就业岗位和高薪工作，也会吸引内地人才加盟。”

不赞同“兴趣决定论”

梅彦昌祖籍广东，出生于新加坡。“我父亲年轻时从广东台山来到新加坡谋生，二战期间和我母亲结婚。结婚那天晚上，日本人在新加坡投下了炸弹，结果前来庆祝的亲友都被吓跑了。”梅彦昌对记者说。

婚后，梅彦昌的父母生了11个孩子，他排行第九。“我们那时是非常穷的，只有一间小小的屋子，床上睡不下，就地上睡。”

忙于生计的父母无暇顾及每个孩子。有一次，梅彦昌突发奇想，决定“离家出走”，想看看父母多久能发现自己不见了。他在外面待了两三天，饿得受不了又自己回了家，结果发现父母从头到尾都没注意到这件事。

虽然没有人管梅彦昌的学习，他却自己找到了乐趣。十三四岁时，图书馆成了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什么书我都读，也不是为了考试，就是感兴趣。”拿到第一个玩具时，他就把它拆开，研究里面的构造。这种好奇心和求知欲一直延续至今。他常对学生说，学习不仅仅是为了考试，学习的意义是探求“为什么”，“受教育和拿文凭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尽管认为兴趣很重要，但梅彦昌并不赞同“兴趣决定论”。“孩子们经常说，我喜欢这门课，我不喜欢那门课。其实他们并不真正了解一门课的价值。有时候，他们只是因为喜欢或不喜欢某一门课的老师，便可能轻易地产生兴趣或失去兴趣。”

在梅彦昌看来，兴趣是完全可以后天培养的，所以不必过早决定未来的方向，更不必因为老师的某一句话失去自信。他读高中时，问过物理老师一个超纲的问题，老师认为与考试无关，还骂他“蠢货”。“我当时很生气，但他骂他的，我学我的，考试时用成绩证明我不是蠢货。”

1977年，在新加坡服完兵役的梅彦昌，申请到去澳大利亚读本科的机会。在墨尔本的蒙纳士大学，梅彦昌度过了4年时光。为了赚生活费，他干过许多兼职，其中之一是出租车司机，为此他专门考了当地执照。

有一年冬天，他开车转了一个多小时才遇到3名外籍女士要打车。但她们拉开车门看到梅彦昌后，只说了一句“He is Chinese（他是中国人）”就走了。“那时种族主义盛行，我是自卑的。”梅

彦昌说，“刚到澳大利亚时，我在机场第一次遇到外籍服务员帮我拿行李，感到害怕，不敢让他拿，潜意识里觉得外籍不应该为亚洲人服务似的。”但4年之后，他不仅学到了知识，也变得更自信了。“我做了很多工作，见到了形形色色的人，我发现亚洲人同样可以学得更快、做得更好，这是一个非常大的收获。”

“他们总会回来的”

本科毕业后，梅彦昌回到新加坡继续深造，博士毕业后进入学术界和企业界发展。“作为新加坡人，我其实很羡慕香港，因为它背后是一个强大的祖国。”梅彦昌说，“设想一下，如果香港是太平洋上的一个小岛，全世界还会有这么多资本、人才来找它吗？香港的未来是与深圳、与大湾区、与内地连接在一起的。”

走遍世界后，梅彦昌对东西方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他认为，中国最强大的地方就是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中国不仅仅是一个国家，更是一种文化。美国则更像一个国家概念，可能由于教育体系和社会环境的影响，美国人的全球视野各有不同，甚至有些美国人对本国以外的认知相对有限。”

梅彦昌是听着父母讲广东话长大的，但新加坡的教育环境以英语为主。长大后，他几十年没有讲过广东话，直到担任港城大校长后，才又重新拾了起来。

“在香港讲英语，大家最多是尊重我，但一讲广东话，马上就拉近了彼此之间的关系。哪怕我讲得磕磕绊绊，同事们、学生们也总是鼓励我。”梅彦昌笑道。

在他看来，大学的英文单词“University”中，包含了“universe”，即宇宙性、国际性。因此，他鼓励学生前往世界各地交流学习，也吸引外国学生来香港读书，既希望港城大更加国际化、多招收世界各地的优秀人才，也希望香港本地的学生走出去，多看看外面的世界。近日，英国知名教育研究机构泰晤士高等教育公布了2025年度“全球最国际化大学”榜单，港城大蝉联榜首。

“我鼓励年轻人环游世界，也不担心他们留在海外。如果他们足够聪明，他们总会回来的。我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信心。还有哪里比中国更安全、更有发展机会？我接触的很多西方人都觉得住在中国更好，觉得这里和平稳定、生活水平高。很多国家也已经意识到，是他们更需要中国，而不是相反。”

环球人物



2024年5月，香港城市大学与英国埃克塞特大学确定在数码医学等领域加强合作。



2024年6月，梅彦昌（左）在泰国参加全球可持续发展峰会。

“排雷英雄”杜富国：坐火车被一车厢人“追星”

近日，在昆明开往遵义的列车上，因排雷失去双眼双手的杜富国被列车员和乘客“追星”，杜富国说：“很高兴在列车上和大家见面，我只是一名普通的扫雷兵，只是做了自己该做的事。”

就在当天列车出发前，一批新入伍的云岭子弟兵也在云南昆明火车站遇到了杜富国，站前广场瞬间成了“追星”现场。

杜富国的寄语也让即将踏入军营的新兵

们激情满满，“在这里遇到大家很高兴，我有一句座右铭送给战友们，‘浴火淬炼成大器，愿得此生永报国’。”杜富国的发言犹如出征动员，听得新兵们热血沸腾，这次偶遇也将让这些新兵心底种下敢于牺牲、乐于奉献、奋力拼搏的英雄种子。

2018年10月11日下午，南部战区陆军扫雷排爆大队在云南省文山壮族苗族自治州麻栗坡县猛洞乡老山西侧进行扫雷作业。“你退后，让

我来”，危急时刻杜富国挡开战友，自己却被一颗加重手榴弹炸伤致残，失去双眼、双手。

面对失明的黑暗和身体的残缺，杜富国说：“我要向前看，我不向后看。”坚强的信念直击人心。

杜富国曾说，要为人民扫干净最后一片雷区，为了群众能有一个幸福安宁的生活环境，一切的牺牲，值得！

央视新闻客户端



张瑛在查看检查结果，为患者分析病情并制定治疗方案。



张瑛在海拔5100多米的西藏阿里地区巡诊。

张瑛的手机壁纸是一幅来自高原的星空图，夜幕低垂，净空无云，星星如绒布上铺展的钻石。拍摄者是张瑛曾救治过的蒙古族战士措格特，他所在的哨所驻扎在海拔5100多米的西藏阿里地区。

这里是张瑛最熟悉的地方之一。作为联勤保障部队第941医院重症医学科主任，张瑛曾在生命禁区连续坚守360多个日夜，40多次徒步到海拔4800米以上的一线点位巡诊，成功救治了25名高原病重症患者。

多年来，张瑛始终奋战在高原病防治一线，倾心呵护高原官兵和群众健康，不断探索高原卫勤保障新模式，累计抢救危重症患者3800多人。

“我的战位在高原”

从地方高校毕业后入伍的第二年，张瑛就参加了高原医疗队。那一年，她25岁，是队伍里年纪最小的。

车子在起伏的山路上走走停停，悬崖边一道又一道
 的弯让第一次参加高原巡诊的张瑛提心吊胆。

正是刚入秋的季节，巡诊的哨所门前早已积雪成堆。初到高原的她一步一喘，三步一停，每一步都能听到自己的心跳声。晚上，张瑛几乎一整夜没合眼。

从那时起，张瑛开始关注高原环境对人体健康的影响、高原地区的各种疾病及救治方法，逐渐把高原病防治工作作为研究的重点方向。

此后，张瑛几乎年年赴高原执行任务，有时是巡诊，有时是给一线官兵体检。尽管每次都要与强烈的高原反应作斗争，但她从未停下脚步。

“我的战位在高原。”张瑛说，“军医到高原去，就是要让一线官兵安心，让他们觉得卫勤保障力量一直在他们身边。只有切身体会过高原的苦，才能设身处地思考高原官兵的健康医疗需求。”

这些年，张瑛和战友们的足迹遍布了最艰苦、最偏远的边防哨所。官兵们只要看到一个背着巨大医药箱、被风吹得摇摇晃晃的瘦小身影，就知道是张瑛医生来了。

“战士守护高原，我们守护战士”

“高原上的情况瞬息万变，生病的症状也各不相同。巡诊时，医护人员需要就地为官兵诊疗。”张瑛说，携带的药物要尽可能覆盖所有高原病症，能带多少带多少。

“战士守护高原，我们守护战士。”张瑛说。在与官兵的接触中，她不断总结治疗方法，汇总了很多防治高原反应的“小偏方”，帮助初上高原的官兵减缓不适，深受边防官兵欢迎。

为了提高官兵面对高原突发疾病的应急自救和互救能力，张瑛和队友们将复杂的医学知识印制成浅显易懂的“口袋”手册，每次巡诊时都会带一些分发给边防官兵，这些小贴士一度成为许多边防官兵的随身物品。

围绕急性高原病诊断与治疗、高原科学用氧指征等，张瑛先后赴多个驻训点位进行高原病防治知识授课，开展健康宣教近百场，为部队留下了“带不走的医疗队”。

“军医的冲锋不止在战场”

医院重症医学科护士长李亚娟和张瑛共事20多年，在她看来，张瑛除了治病就是学习，仿佛永远不知疲倦，一切都是为了官兵、为了病患。

2023年初，医院计划组建重症医学科。张瑛主动请缨，第一时间向院党委提出了申请。

有人觉得这是件苦差事，私下劝她没必要这么辛苦。“军医的冲锋不止在战场。”张瑛很坚定，“我们需要一个重症医学科，这样才能更好地守护官兵的生命健康。我在呼吸内科积攒了多年的抢救经验，我应该做。”

几个月的时间里，从科室选址、规划布局，到提报设备采购需求，甚至是病床、柜子的挑选，张瑛事无巨细，先后十几次带队去其他医院的重症医学科参观学习，大大小小的论证会开了几十次。

6个月后，在张瑛和战友们的努力下，重症医学科具备了全面开展业务的能力，运行1年就成功抢救120余名危急重症患者。

许多被救治的病患出院后送来锦旗，有的几年后还和张瑛保持着联系，不少被救治过的高原官兵也寄来书信，跟她聊聊哨所里的新变化、身体恢复后取得的好成绩。

“除了会看病，我没什么优点了。”在张瑛看来，无论身处何地，她只是一名普通的军医，做了分内的事，并且会一如既往地做下去。

新华社

军医张瑛：用脚步丈量『生命海拔』

